

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

——回应阎学通的“假朋友”理论

江忆恩◎

【内容提要】 阎学通对 30 年来中美关系从稳定走向不稳定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认为中美之间是一种假朋友关系，过度乐观会导致双方对彼此过度失望。假朋友关系所依赖的理论支撑是个人和小团体的心理特点。阎学通利用事件数据来检验中美关系总体的冲突与合作模式，但这些事件数据并不必然捕捉到个人和小团体水平上的变化；与此同时，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事件和特点趋势的编码也有可以商榷之处。笔者认为，安全困境是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替代性解释，而且中美关系仍然存在着诸多稳定性因素。

【关键词】 中美关系 稳定性 不稳定性

一、概述

围 绕建交 30 年来中美关系为何依然不稳定且实际上变得越发不稳定，阎学通最近的文章作出了高明的解释。^①

^① Yan Xuetong,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3, 2010, pp. 1-30. 此文的中文版本《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12 期，第 4—30 页，阎学通在个别地方增加了中美关系在 2010 年 8 月至 10 月发生的事件。

《国际政治科学》2012/2（总第 30 期），第 107—132 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他提出了“假朋友”的概念。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这么说,但他应该是提出了一个关于期望过高与失望的理论。也就是说,双方领导人错误地相信双边关系比实际情况更具合作性,因此,当他们收到来自对方的负面信号时,他们的期望就会轰然倒下;他们的反应会比期望更具现实性时更强烈。

一些人可能认为,这种失望的感觉在奥巴马与胡锦涛的互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与往届总统不同,奥巴马并非凭借在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抨击中国而上台。他提议两国就一系列全球治理问题密切合作。根据维基解密网(Wikileaks)发布的一份美国国务院秘密文件,中国外交政策主管官员(国务委员——编者注)戴秉国2009年形容两国之间的互动像“老朋友”那样。^①在2009年11月胡锦涛与奥巴马的会谈中,双方同意不去挑战彼此的核心利益。然而,2010年1月,也就是这次成功会谈之后不到两个月,美国就决定批准先前通过对台军售以及一笔新的对台军售。一些中国学者在媒体报道中称奥巴马是“伪君子”(false gentleman),虚伪且无耻。有趣的是,“失望”同样适合概括美国如何评价2010年的两国关系。《华盛顿邮报》甚至将其所谓美中政策进程内部倾轧的一部分称为“伤心和失望”。^②

因此,阎学通关于中美关系特性的描述看起来非常切题。他指出,这种过度期望与失望的循环其实不仅是过去一两年的特色,而且是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主要特点之一。只要双方拒绝承认它们主要的冲突性和竞争性利益超过了非冲突性利益,这种不稳定性就会继续存在。这当然是总览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后非常深思熟虑的分析,但请允许笔者节省下赞誉的时间,而提出一些质疑。笔者认为,在进一步发展这种“假朋友”理论之前,必须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第一组问题与理论相关,第二组问题与证据相关,第三组问题与替代性解释相关。

① “Deputy Secretary Steinberg’s September 29, 2009 conversation with State Councilor Dai Bingguo,” October 26, 2009, <http://213.251.145.96/cable/2009/10/09BEIJING2965.html>.

② Bill Gertz, “Inside the Ring,” *The Washington Times*, October 20, 2010,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0/oct/20/inside-the-ring-875212385/>.

二、理论

阎学通的基本假设应当是，由于过度乐观，“假朋友”关系会导致过度失望；这反过来会导致美中关系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的美中关系起起落落。这一论断有直观的感觉，但可以借鉴心理学研究，以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加强其理论性。

实际上，一些心理学文献可以给阎学通的假朋友理论提供微观基础。例如，一些研究显示，在成功渡过一段存在高风险的经历后遭遇挫折，失望感会增加（例如，我交好运，获得一个能够获益很多的位置，如果这些获益不能实现，我会比没有交好运的情况下更失望）。^① 这意味着，美中领导人相信两国关系成功渡过一些危机之后，如果再度遇到问题，可能会更加失望。或许这可以解释 2010 年所谓的高度不稳定性，前提是中美两国为 2009 年双边关系拥有一个良好的开始而有些意外的高兴。

但另一方面，另一些关于期望与失望的心理学文献则表明，随着时间流逝，一个人可能会预见到更低水平的假朋友关系。例如，关于失望、愤怒和不满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暗示，失望包含四个因素：因没有能力实现个人目标而沮丧；因出错而吃惊；失败感；以及因被证明没有能力预测事情而伤自尊，而且如前景理论所指出的，会因为失去预期利益而伤自尊。^② 行为者将从这些经历中吸取教训，以降低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反过来，他们会预先降低下一回失望的程度。这或许能稳定他们与互动者的关系。

这一理论的另一版本是，在经历一些失望后，行为者将朝着更悲观

^① David Bell, “Disappointment in Decision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Operations Research*, Vol. 33, No. 1, 1985, pp. 4–5.

^② 参见 Cristiano Castelfranchi and Emiliano Lorini, “Cognitive Anatomy and Functions of Expectations,” in *Proceedings of IJCAI03 Workshop on Cognitive Modelling of Agents and Multi-Agent Interactions*, Acapulco, Mexico, August 9–11, 2003.

的方向调整他们的预期。这样,久而久之,人们应当看到与互动者的关系变得更具冲突性(但却可能更稳定)。^①如果是这样,这可以预见一个不断更新或相互学习的进程,例如1999年或2001年之后,美国和中国应当朝着更悲观但更稳定的方向思考他们的双边关系(而这就会与阎学通的论断相矛盾,他认为中美关系将持续并越来越不稳定)。

不过,另一些文献所作的预测或许符合阎学通关于不稳定性将持续的经验论断。这些文献认为,维持假朋友关系是出于某种策略,而并非出于一种深深内化的错觉。一些证据显示,如果对方表达失望而不是一点情绪都没有,另一方更可能让步。^②这样,为了刺激对方让步,另一方行为体可能策略性地为获取利益而表达失望。^③

但别的文献却阐述了关于失望的一种完全不同的行为上的意义:仅仅不满,并不必然会导致采取先期的冲突性的反应;相反,失望往往会导致基于无助感基础上的行为上的迟钝性,而并不会导致某种更好斗或更愤怒的反应。^④

根据互动的复杂性,过高期望和失望对某对关系的影响程度也有可能不同。对一些主要议题的范围非常狭窄的关系而言,过高期望和失望的影响本身相对可能更容易发生变化。而在更复杂的关系中,多重议题一个挨着一个,总体关系可能更稳定:某一议题领域的过高期望或许会被另一个议题领域更清醒或更“现实”的评估以及日常互动所抵消。

当然,过高期望、失望以及破碎的期望是个人和小团体的心理特点,民

① David Bell, “Disappointment in Decision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p. 1.

② Gerben Van Kleef, Carsten De Dreu and Antony Manstead, “Supplication and Appeasement in Conflict and Negotiation: The Interpersonal Effects of Disappointment, Worry, Guilt, and Regre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91, No. 1, 2006, pp. 124–142.

③ 另一种关于维持假朋友关系的策略性或工具性解释是,行为者目的是影响另一方决策进程。一方或双方或许会得出结论认为,假朋友关系甚至可以减少对方对己方行为的恶性解读。假朋友关系可以以鼓励对方内部温和派的方式来设计并释放出信号,随后,这些中间派就会把释放信号方的温和行为视作采取某种温和政策有价值的依据。不过,这种解释与心理学意义上的失望没有太大的关系。

④ 参见 Roger Bougie, Rik Pieters and Marcel Zeelenberg, “Angry Customers Don’t Come Back, They Get Back: The Experience and Behavioural Implications of Anger and Dissatisfaction in Service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Vol. 31, No. 4, 2003, pp. 377–393.

族或国家并非如此。所以，如果要检验更容易观察的意义，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做得更为微观。可将理论做出适当调整以适用于国家间关系，同时还可推导出更多的可观察的含义。如果某种失望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在外交政策话语中，在政策进程中所产生的或没有产生的论断中，在政策所涉及的行为体中，在单边、双边或多边行动中，我们预计将会观察到什么？能否根据对过高期望和随后失望的偏好对不同领导人进行分类？

阎学通的确使用了事件数据来检验中美关系总体的冲突与合作模式，并将其作为假朋友关系导致不稳定性的证据。但是，正如笔者将在下文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数据只是寻求证实（或不证实）这一论断的一部分，而且这些事件数据并不必然捕捉到个人和小团体水平上的变化，毕竟，心理因素的影响在个人和小团体水平上最容易观察。

三、证据：对利益的编码

针对阎学通“假朋友”理论的第二组问题关乎怎样给美中关系事件编码以及怎样刻画中美关系的趋势。阎学通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过高期望和失望的循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中关系相比以往更不稳定（意指短时期内冲突性和合作性行为之间的变化更大）。这种不稳定性反映出两国（有限的）想象的合作性利益和更常见的冲突性利益之间存在根本性脱节。所以，他的论断非常依赖于向读者展示美中关系事实上存在大量潜在的现实或客观的冲突。他文章的表1（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突出地展示了这些冲突。

笔者无意指出阎学通文章表1的编码一定是错误的，而替代性编码一定是正确的。但笔者认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一些阎学通按他的方法编码的议题似乎有理由可以按不同方式编码；第二，表1遗漏了美中关系的其他一些议题。因此，他关于美中关系不稳定性的评估可能存在有效性和可靠性两方面的问题。

接下来，笔者将举出一些笔者认为有问题的编码。其中一处是阎学通把竞争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与中国的威权发展主义）

与南中国海控制权一并列对抗性利益。尽管一些政治评论人士在谈论“北京共识”，但笔者认为美国政府中许多人至少在现阶段并不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美国或美国核心利益构成了太大威胁。^① 尽管意识形态分歧是两国之间身份认同差异的原因之一，但美国政府并没有显露出相信这些分歧正蔓延为为争夺第三方而展开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竞争。实际上，笔者曾经听到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这样一位典型的保守主义者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主张朝鲜采用中国的发展模式。

另一处有问题的编码是，把中国新疆地区恐怖主义的活动与台湾问题并列为冲突性利益。美国非常明确地表示承认新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就中国把国内某些分离主义运动定性为恐怖主义，美国内部的确存在一些质疑，但是，通过2002年把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列入恐怖组织，美国实际上在中国打击伊斯兰武装分子所制造的暴力活动方面提供了帮助。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国允许中国官员接触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一些维吾尔族人。美国正通过派遣一支核紧急事态支援小组携带敏感的放射性物质检测装备前往中国，帮助中国应对针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潜在恐怖袭击。^②与新疆的情况相反，美国现阶段尚未在法律上承认台湾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主要原因是美国认为需要遵守对东亚地区正式盟友的承诺。在笔者看来，这与两国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承诺的分歧不是同一类型。

阎学通同样把伊朗核问题列为冲突性利益，维基解密网所披露的美国国务院文件表明，两国尽管在策略上有一些分歧，但有更多的共同目标。一份文件提到，戴秉国与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会晤时说，“中国

① 围绕是否存在所谓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中国内部正在进行一场辩论。参见潘维：《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关于对所谓“北京共识”的观点更彻底的批判，参见 Scott Kennedy, “The Myth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9, No. 65, 2010, pp. 461–477.

② Shirley Kan, “U.S. – 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Issue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uly 15, 2010.

和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看法一致。核国家应当以最终销毁核武器为目标减少它们的核武库,并且应当阻止包括伊朗在内的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然而,中国和美国就我们应当如何推动这些目标有着不同的考虑”。^① 当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批评伊朗核项目或认可制裁时,即便这一信息在美国眼中效果变弱,这究竟应该被视为合作还是冲突,或者介于两者之间?

除了一些值得质疑的编码,^② 还有一些利益为表 1 所遗漏。例如,鉴于中国国内一些观点认为中国需要一支恰好能够阻止或威慑美国独霸海上交通线的海军,国际货运问题可以被列入冲突性利益。关于文化利益,人们可以想象把社会价值观议题加入冲突性利益——中国可能会推动某些儒家价值观与美式自由主义的竞争。中国降低海峡两岸紧张程度的努力似乎有理由列为共同利益或互补利益,因为美国和中国都将从降低因“台湾独立”而引发战争的概率中受益。类似地,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微妙的美国核战略变化与中国形成相互威慑关系,可以被列入共同或互补安全利益。^③ 美国支持二十国集团机制,可以被列入共同利益,因为根据泄露的美国国务院文件,一名中国官员曾经感谢奥巴马总统“在使二十国集团机制化上发挥了领导作用,为向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发挥更大作用创造

① “Deputy Secretary Steinberg’s 29 September, 2009 Conversation with State Councilor Dai Bingguo”.

② 表 1 之外的一些描述和编码也存在问题。例如,阎学通主张,两国集团(G2)或“中美”之类的话语反映了一种有关经济领域共同利益的错误或误解的观念。他说,这些观念是对实际冲突性利益的臆想和不正确描述(第 15 页)。笔者赞同他关于这两个观念都不正确的论断。但要注意到,没有一名高级别美国领导人曾经认可其中任何一个概念。这些概念来自媒体和政治评论人士群体,他们聪明,善于吸引眼球,说话灵巧,但他们的观点不被官方相信或认可。

③ 2010 年《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确呼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以相互威慑为基础的战略稳定性。报告把中国和俄罗斯一同列为美国建立战略稳定性努力的目标(第 4 页至第 5 页)。报告随后把战略稳定性界定为要求确保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第 20 页)。尽管不是全部,但中国多数分析人士忽略了这一解释或看低其重要性。关于接受这一解释的分析,可参见 Yao Yunzhu, “A Chinese Perspective on th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Proliferation Analysis*, May 6, 2010,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dex.cfm?fa=view&id=40758>。也参见 Michael S. Chase, “The U. S. – China Strategic Security Relationship and th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China Brief*, Vol. 10, No. 9, 2010, [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chinabrief/single/?tx_ttnews\[tt_news\]=36325&tx_ttnews\[backPid\]=25&cHash=685ebb22d5](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chinabrief/single/?tx_ttnews[tt_news]=36325&tx_ttnews[backPid]=25&cHash=685ebb22d5)。

了一个‘舒适’的平台”。^①

阎学通在表 1 中的编码凸显了他更为宽泛的论述,即美国和中国实际上无法或无意支持彼此的核心利益,因为这些利益在许多方面相互冲突。^②但是,笔者认为其中也有比阎学通所表明的更复杂的证据。他的结论低估了美国无意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程度。正如胡锦涛、温家宝、戴秉国和外交部官员多次界定的那样,中国明确表明核心利益包括维护政治制度、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防止新疆、西藏和台湾独立),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③美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反对几乎所有这些中国的利益。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两国交好,美国在有关这些核心利益的对华政策上出现了 180 度的转弯。现在,美国并没有积极策划推翻中国共产党,它支持中国发展经济并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这实际上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关于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美国在法律上承认西藏和新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美国现在不支持台湾“法理独立”(“法理台独”),并且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阻止了陈水扁“政府”朝那个方向前进。实际上,中国政府非常满意美国为反对陈水扁 2007 年就台湾加入联合国举行“公投”(“入联公投”)所做的努力。美国或许不会承认中国现阶段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一些领土主张,但同样没有承认其他声索国的主张。

阎学通关于共享和非共享利益的分类是多种利益的混合体,包括官方宣布的利益,以及他推论的利益。他认为,不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源头是美国渴望维持全球领导地位和中国渴望“重新获得历史上曾经拥有的世界主导地位”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关系。^④他认为后者属于中国的利益。鉴于挑战或取代美国而成为体系主导国不是官方政

① 参见美国大使馆关于 2009 年 9 月 29 日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与中国官员会晤的文件, <http://213.251.145.96/cable/2009/10/09BEIJING2963.html>。

② Yan Xuetong,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 – US Relations,” p. 20.

③ Michael Swaine,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ur Part One: On Core Interest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34, 2011.

④ Yan Xuetong,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 – US Relations,” p. 12.

策，而且没有证据能够明显证明或证伪最高领导层内部深信这是中国利益所在，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评估这种方法。美国当然公开拒绝放弃“领导角色”。但这是否意味着围绕霸权存在着冲突性利益？这不是中国一方可以决定的。此外，美国官方支持中国崛起，我们该如何判断美国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定位？而对于那些官方表明利益而言，我们又如何知道它们是真实动机的权威表述？对那些没有正式表明但由阎学通本人推论的利益，我们又如何知道这些利益真实存在？

简而言之，笔者认为表1列举利益时有一定程度的武断。如果人们可以对阎学通所列清单中的许多利益重新编码，或者在现有表1中添加一些缺少的“利益”，那么共同、互补、冲突性和对抗性利益现有的对比或许会改变。这将影响对中美关系稳定性和不稳定性总体评估。从根本上说，阎学通的文章对因变量的操作化和测量存在问题。这反过来引发了我们对“假朋友”关系理论检验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质疑。一个建议是，阎学通需要给出一个明晰的标准，告诉读者这张表为什么应包括这些议题，并告诉读者以他的方式为这些议题编码为什么是合理的，以及为什么要将其他一些议题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

不过，阎学通对利益的编码倒是引发了一个非常深入、需要动脑筋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国家利益来自哪里。如果我们放弃“国家利益是不言自明的”这种观念，或者从国内角度审视利益，或者认为利益是多重的且时常冲突，那么断言存在客观的（以及/或者结构性的）利益冲突或利益聚合的做法就明显存在问题了。阎学通关于美中两国在全球金融和贸易改革方面的利益的讨论体现出，使用类似冲突性或不利的利益这样的用语是多么的复杂和困难。^①一方面，从一系列国内利益角度看，美国利益与中国利益存在冲突，也就是说对于两国国内那些希望维持权力的人来说中美利益存在冲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想冒人民币快速且大幅度升值而导致不稳定后果的风险。美国政治人物则不想被认为没有能力让中国进口

^① Yan Xuetong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 – US Relations,” p. 15.

更多美国产品。但另一方面,当我们评估美国或中国国家利益时,为什么非要将考虑的范围局限于执政精英的利益呢?从消费者之类的其他国内群体的视角看,人们有可能就国家利益作出相反的论断。中国消费者将因进口价格相对降低而受益,进而与美国领导人“分享”利益;而对美国而言,以现有的较低价格从中国进口商品将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从而使美国消费者获益,这又与中国领导人“分享”了利益。面对这些复杂的经济关系,究竟什么才是国家利益呢?

从根本上说,这里的问题在于,感知到的利益和某些潜在或既有利益之间在理论上存在截然的差异。阎学通的论断就建立在这种差异之上。如果不存在差异,那么就不会有虚假的友谊,因为不会有臆想。因此这种感知利益和实际利益之间的鸿沟只有在他相信实际上存在真实利益时才会存在,“当两国都想象它们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时,就是假朋友关系”。^①但他没有明确说明这些既有、固定或真实的利益是什么,它们又是从哪来的。正如前文所述,其中一些利益可能实际上是由政治行为体所决定的(例如中共希望维持权力,因此“中国的利益”是维持出口增长以对抗美国让人民币升值的渴望)。但即使如此,依然难以称它们为领导人固定、既有和独立的观念。或许是阎学通的物质现实主义观点让他相信,存在所有国家所共有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是固定和既有的,是美中冲突的源头。但他并没有真正告诉我们这些利益是什么,为什么它们独立于观念。结果,他自己对于中国利益的主观定义与假朋友关系所遮盖的某些“真实的”冲突之间的差异被模糊了。但建构主义(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仍然会问:鉴于(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主体间知识引发行为,那么关于感知或想象的利益,有哪些是不真实的?

实际上,笔者可以作出这样一种论断,即所有阎学通在表1中列为冲突性、对抗性、共同和互补的利益,要么是基于政治领导人作出的选择,要么已经被深刻地内化,以至于不再被质疑。因此,我们很容易想象,不

^① Yan Xuetong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 – Us Relation,” p. 18.

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决策，或者不同的人会将不同的利益视为理所当然的。例如，在共同利益这一栏，无核化之所以是美中的共同利益，或许只是因为没有任何一方认为一个核多极世界是稳定的。而另一方面，一些高明的人士却坚信核武器多极化将会导致稳定。^①而实际上过去又的确曾有一段时间，即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领导人却倡导核武器多极化，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因为在当时这有助于制衡和约束美国的权力。当然，中国对核不扩散问题的态度现在已经改变。

在互补利益这一栏，人们可以认为，双边贸易是美中利益，因为自由贸易理念在两国，事实上在全球，都取得了胜利。然而，曾有一段时间，国际经济新秩序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张。而现在，市场理念则已经根深蒂固，尽管实际上在自由市场经济体中显然存在绝对输家和相对输家。

在冲突性利益这一栏，人们可能会认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列在这一类的主要理由是中国国民党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决定改变其有关台湾地位和重要性方面的立场。^②或者是因为美国相信（这一方面的证据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还要少）对台关系事关美国对盟友安全承诺的可靠性。

之所以将南中国海控制权列入对抗性利益，只是因为在中国有关利益的概念中，领土权和主权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对中国历史进行刻意民族主义式解读的产物。它不是固定的，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必然强烈认同的。与地理、物质实力分布或无政府状态相关的任何概念都没有指向这种利益界定的方式。

简而言之，由于对利益的编码存在问题，阎学通的分析或许夸大了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程度，进而也或许夸大了双方失望和期望破灭

① Scott D. Sagan and Kenneth N.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A Debate* (New York: Norton, 1995); Kenneth N.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More May Be Better," *The Adelphi Papers*, No. 171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81).

② Alan Wachman, *Why Taiwan? Geostrategic Rationales for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的程度。

例子之一是, 阎学通断言美国 2010 年初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对台军售上作出合作性反应。他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加以证明。^① 不过, 笔者认为这不是对原话的准确解读。这名官员并没有说美国期待合作性反应, 只是说中国的反应不会超过美国预期。实际上, 《华盛顿邮报》2010 年 1 月 3 日报道, 在宣布新的对台军售和达赖喇嘛访问前, “政府官员说他们确信中国将对军售和会晤达赖喇嘛作出负面反应”。^② 尽管美国官方对中国可能反应的评估夸大了这种预知, 但中国的反应程度与以往相比可以说并没有超出太多。尽管中国首次表示将考虑制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 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中国同样暂停了与美国的军事关系, 但中美的军事交流以前也曾中止过。中国外交部 2010 年对达赖喇嘛访美的反应可以说比 2007 年时还略显温和。^③ 对台军售和达赖喇嘛访美本不应该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令中国政府惊讶。正如泄露的美国国务院文件所披露的, 根据双方沟通的程度判断, 这两件事中方肯定事先都已经得到了通知。

阎学通关于中美关系不稳定性 (以及过高期望和失望) 的断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及其同事所从事的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数据编码定量研究项目, 他在图 1 中对其进行了概括。这一项目包括对大多数中国政府声明、行为和立场进行编码, 依照固定的区间尺度, 一端为严重对抗 (-9), 另一端为非常友好 (+9) 。为了考虑先前事件对后续事件权重的影响, 改进更为标准的事件数据编码, 这一项目投入了复杂而精

① Yan Xuetong,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 – US Relations,” pp. 20 – 21.

② John Pomfret, “U. S. – China Relations to Face Strains, Experts Say,”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 2010.

③ 2010 年声明舍弃了 2007 年回应时使用的一些更严厉的措辞。例如, 2007 年, 美方行为被形容为 “粗暴” (crude) 干涉中国内政; 2010 年, 这一行为被形容为 “严重” (serious) 干涉中国内政。2007 年, 外交部声明指责美国 “严重违背” 美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但 2010 年声明没有 “违背” 一词前使用 “严重”。参见《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就美国国会向达赖 “颁奖” 发表谈话》,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bmz/1206_22/fyrygth/i373510.htm, 访问时间: 2011 年 2 月 21 日; 以及《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就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发表谈话》,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fyrbt/t659081.htm>, 访问时间: 2011 年 2 月 21 日。

细的努力。^① 但尽管如此，笔者依然不确信这一定量证据可以证明阎学通对冷战后中美关系格外明显的不稳定性的特点描述是正确的。

例如，使用这一项目 1989—2008 年的数据，^② 拟合走势线显示，年平均分值随着时间增加，年平均绝对偏差^③减小。按月分解的数据显示类似的趋势。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关系改善，其波动性降低（见图 1 和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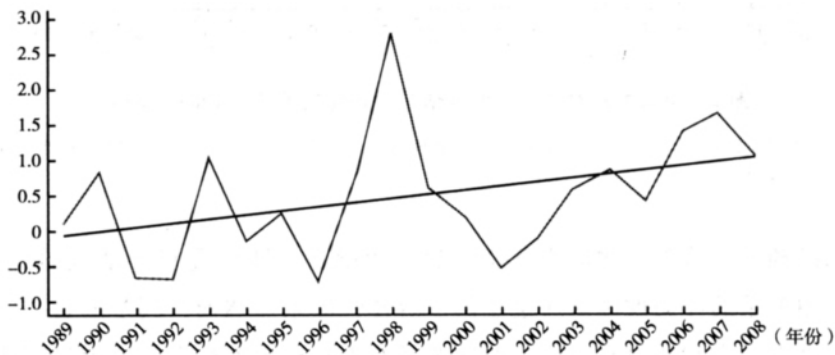


图 1 中美关系对抗—友好年平均分值 (1989—2008)

资料来源：阎学通等著《中外关系定量预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9 页，表 1。

假朋友理论不会预见到这些趋势，尤其是图 2 所显示的，因为中美关系在 2000 年以后甚至更虚假。毕竟，当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时，按照一些衡量指标（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显得尤为明显。这 10 年始于更倾向于视中国为威胁的布什政府的上台。鉴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层 2002 年才上台执政，人们可以同样预言中国会更不愿意姑息

① 简而言之，标准事件数据将以相同方式给事件 X 编码，而不论其来自冲突性还是合作性举动。阎学通及其团队正确地指出，这种统计方式没有考虑到先前互动的质量如何影响对后续行为的解释。关于阎学通团队事件数据分析项目的更多具体内容，参见阎学通等著《中外关系鉴览 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阎学通、漆海霞等著《中外关系定量预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Yan Xuetong, et al, *Quantitative Predictions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p. 39.

③ 就研究非正态分布数据的方差而言，平均绝对偏差是更可靠的推定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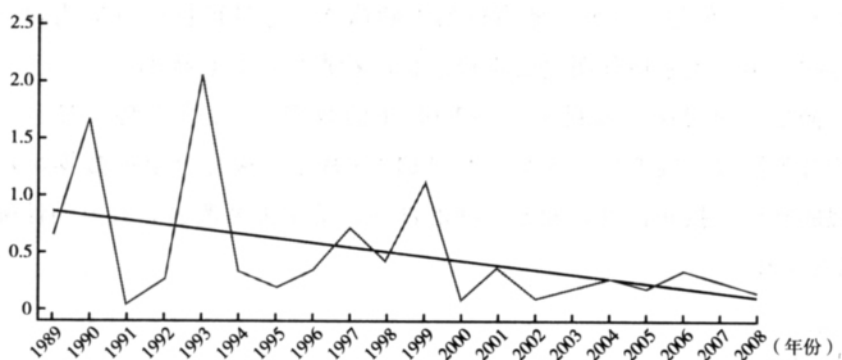


图2 中美关系对抗—友好分值年平均绝对偏差 (1989—2008)

资料来源: 阎学通等著 《中外关系定量预测》,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39 页, 表 2。

美国的利益。这些变化应当支持阎学通的论断, 即尽管双方都试图掩盖, 但中美关系的冲突性因素还是压倒了合作性因素。然而, 阎学通自己的事件数据看起来却并没有表明, 两国关系在冷战后更不稳定。这引发了我们对“假朋友”理论前提的质疑, 即“要探究为什么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如此跌宕起伏”。^① 结果显示, 至少到 2009 年, 阎学通自己的数据反而表明中美关系正变得更加平稳 (而且更加积极)。

四、替代性解释

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常见解释集中于民族主义或两国之间权力分布变化, 阎学通对此提出怀疑是正确的。正如他所指出的, 所谓民族主义高涨并不能解释因变量 (不稳定程度) 的变化。笔者要补充的是, 要想用民族主义来解释, 必需首先要有一种关于公众舆论如何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可能合理的理论。但至今没有学者提出或验证这种理论, 更不用说政治分析人士和媒体评论员了。而权力分布的变化则被政治分析人士夸大了,

^① Yan Xuetong,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 – US Relations,” p. 23.

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在经济绝对量、军费开支和人均 GDP 方面，中国依然与美国存在巨大差距的时候。^①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阎学通还可以考虑除了他在文章中所批判的两种解释之外的其他解释。安全困境理论^②无疑可以提供一种替代性解释。安全困境有以下特征：两个或两个以上本质上更多以维持现状为导向的国家，或多或少有着良好的目的，开始怀疑对方是否同样以维持现状为目标；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每一方采取政治—军事措施加强安全；这些措施在本方看来是防御性的，并不威胁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然而，其他国家却把这些措施视为进攻性和威胁性的。结果，不安全感呈螺旋形上升，彼此共同建构出敌对状态。

安全困境是一个内生性的社会进程。随着安全困境的强化，合作性举动的意义会打折扣，冲突性举动的意义会被放大。每一方开始相信本方多少是现状国家，但越来越怀疑另一方不是现状国家。起初，本方的回应只是局限于维持原先的策略，可能希望另一方只是误解了双边关系。但本方随后开始变得认为对方比先前所想的更像修正主义国家，例如，变得越来越倾向于从对方属性的角度对对方得出结论。这又会导致本方重新评估自己先前策略的智慧或恰当性，支持向更强制性政策做出更为根本性的转变

① 关于对“崛起中的中国”之类话语存在不准确之处的批判，参见 Steve Chan, *China, the U. S., and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08); Sheena Chestnut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Rising?,” in Eva Paus, Penelope Prime and Jon Western, eds., *Is China Changing the Rules of the Gam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② 关于对安全困境理论的透彻分析，参见 Tang Shipi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Vol. 18, No. 3, 2009, pp. 587 – 623。其他关于中美关系的可能模型包括战略对立，持久对立或权力转移。前两个模型与安全困境理论并非不相容，实际上，对立引发的不稳定可以说植根于安全困境。两个多少以维持现状为导向的国家之间的对立从逻辑上说可能产生于安全困境，但难以想象这两个国家怎样才能超越安全困境。权力转移理论则假定存在一个不满于现状、高度修正主义的崛起国。一些证据证明眼下历史阶段的中国外交政策是不满于现状、高度修正主义的，但笔者并不信服。关于权力转移理论是否适用于这一案例的令人信服的批判，参见 Steve Chan, *China, the U. S., and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关于战略对立和持久对立，参见 Michael Colaresi, Karen Rasler and William Thompson, *Strategic Rivalries in World Politics: Position, Space and Conflict Esca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aul Francis Diehl, *The Dynamics of Enduring Rivalri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的声音就会响起。所以,安全困境是一种不安全感的循环,可以起始于两个本质上安于现状的国家,结果却是向着更少地维持现状的方向变换偏好。就此而言,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化经历。^①这一进程同样表明,与阎学通的逻辑相反,敌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必然比所谓“假朋友”关系更稳定^②——敌意孕育了安全困境的动力,可以放大并强调恶意的信号和恶意的反应。尽管双边关系并不会在友好关系和敌对关系之间曲折变化,但冲突的概率仍会呈现指数式的增加,或者至少以非线性的方式增加。

为检验安全困境是否正不断成为美中关系的特点,我们需要寻找三项基本证据。首先,我们需要寻找证据证明,本方忽视对方的合作性行为,同时放大对方的非合作性行为,以至于这些行为如今的解读与以往不同;相反,假朋友理论则也许会指出,积极(过高期望)信息和消极(失望)信息都会得到相同程度的放大。

另一个关于忽视合作性行为的术语是有选择性的因变量,即忽略或看低那些显示持续合作的证据。至少在美国政治分析人士和媒体话语中,很少提到诸如中国2010年6月投票赞成就伊朗核计划对其实施新一轮制裁,或是海峡两岸紧张局势缓和对美国安全的积极影响,或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对华出口相比世界其他地区出口所出现的巨额增长(337%对57%),^③或是中国2010年底为确保坎昆气候变化大会成功闭幕而作出让步。^④

① 令人惊讶的是,除了唐世平的文章《安全困境:概念分析》外,很少有作品从社会化过程的角度对安全困境进行理论化。在这种社会化过程中,变化的身份从本质上把安全困境转变为“恶意”修正主义国家之间更趋零和的斗争。与此相反的是,许多关于安全困境的讨论都假定不安全感的螺旋对行为体身份或利益没有影响。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非历史和非社会的国际政治观,这种国际政治观可能是源于物质现实主义对安全困境理论研究的垄断。

② Yan Xuetong,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 – US Relations,” p. 21.

③ *US Exports to China by State, 2000 – 2009* (Washington, D. C.: US China Business Council, 2010), p. 6.

④ “A Near-Consensus Decision Keeps U. N. Climate Process Alive and Moving Ahea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2010, <http://www.nytimes.com/cwire/2010/12/13/13climatewire-a-near-consensus-decision-keeps-un-climate-p-77618.html>; Jennifer Morgan and Deborah Seligsohn, “What Cancun Means for China and the U. S”, *The Network for Climate and Energy Information*, December 15, 2010, <http://www.chinafaqs.org/blog-posts/what-cancun-means-china-and-us>.

而在中方话语中，人们也几乎听不到任何有关奥巴马政府核态势评估报告的积极分析，很少论及美国明确承认两国间存在相互确保摧毁关系对中国安全的潜在积极影响。^① 在公共话语中，中国分析人士至少是倾向于非常少地谈论美国在促进中国经济崛起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包括投资、允许进入美国市场和维护使中国受益的国际机制。^②

其次，我们需要寻找双方越来越忽视或否认两国关系互动性的证据。也就是说，双方应当认为，对方应当完全为双边关系的变化负全部责任，而双边关系的维护则得益于本方的努力。双方都认为自己的举动显然有助于稳定（不论是威慑对方还是相互威慑，或是向对方或彼此作出安全保证）。要政策制定者和带党派背景的政治分析人士承认他们自己的国家应共同承担双边关系的负面后果，通常非常困难。原因之一是，这将暗示本国与对方在道义上是对等的。随着安全困境的演进，这种道义上的平等将变得越来越难以接受。与此相反的是，关于失望的文献并不会必然预言双方会相互责备；相反，这方面的文献只会预计，本方未能预见随后的事态通常只会导致本方自尊受损。

以美中关系为例，可以说，即便我们看到两国军方展现出了更大的互动性的时候，这种内生性的否认对方的举动也会发生。美军提出全球打击能力及其他概念，发展当两国因台湾或专属经济区发生冲突时用来破坏中

① 例外者包括朱传忠、王晓东 《美国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解读》，《国际资料信息》2010年第7期，第23页；以及 Yao Yunzhu, “A Chinese Perspective on th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② 在笔者的印象中，许多中国分析人士没有“领会”奥巴马政府为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努力。笔者认为，奥巴马政府中自由国际主义者认识到美国权力的相对衰落（比布什政府内外的新保守主义者多得多），但他们认为依然需要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如何实现这一点呢？通过强化美国自由主义秩序的机制，特别是与其他国家合作——尤其是与中国，同样增加它们在这些机制中的利益。这样，即便美国权力衰落，秩序本身依然得以维持。这些机制和这一秩序可以说对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非常有利。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与布什政府不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中关系出现的一些摩擦关乎全球和地区治理议题和机制，而布什政府忽略或看低这些议题和机制。尽管如此，许多中国分析人士看起来认为2010年显示奥巴马与往届美国总统没有什么不同，都为了维护美国首要地位而要求中国付出代价。例如，崔立如看起来理解奥巴马政府政策这一更独特的特点，参见崔立如 《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寻求共处之道》，《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3/4期，第70页；以及杨成 《“选择性介入”的回归和美国领导地位的重塑》，《国际论坛》2010年第5期，第11页。

方阻拦美国在西太平洋行动的能力的战略防御武器,这些行为的驱动因素之一看来正是中国军队反介入或区域拒绝 (anti-access/area-denial) 策略及相关能力。这些反介入或区域拒绝能力可能植根于 1996 年台海危机中美国对部署航空母舰的反应,而美国当年部署航母则是回应中国旨在威慑台湾独立的军事演习。我们或许会看到富兰克林·格里菲斯 (Franklyn Griffiths) 界定美苏关系时所描述的现象,鉴于美苏长期领先于世界,军事发展和部署可能并不与两国政治关系的循环同步。^① 当政治关系要求稳定时,军事项目就开始显得与政治关系的要求不相一致。这些军事项目随后就会对政治关系形成制约。

最后,我们预计应当看到越来越多的对对方现状国本质的疑虑。与此相关,我们应当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怀疑现行策略的效力。归因误差开始不断累积,对身份认同的评估开始变化并专注于双方基本属性的差异。有意思的是,一些中国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视中国为“他者”(“异类”或“另类”)或不同于美国自己的类型。^② 北京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年度调查 (Beijing Area Study) 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觉到与美国人存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身份认同差异是观察现实政治 (realpolitik) 政策偏好的一项不错的指标——感知的差异越大,人们越支持对对方采取竞争性政策。^③

① Franklyn Griffiths, "Limits of the Tabular View of Negoti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No. 35, No. 1 (1979/1980), p. 40.

② 例如,《国际先驱导报》2010 年 6 月 28 日对王缉思的访谈《美国眼里中国是另类老大而非国际老二》,网址为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0-06/28/content_20367197.htm, 以及《环球时报》2010 年 12 月 23 日对中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乐玉成(现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编者注)的专访《中国外交既不软弱也没有变强硬》。

③ 这一假设主要来自社会认同理论。关于对外团体 (out-group) 的认同差异感知越大越有助于解释竞争性对外政策偏好的经验研究,参见 Edward Mansfield and Diana Mutz, "Support for Free Trade: Self-Interest, Sociotropic Politics, and Out-Group Anx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3, No. 3, 2009, pp. 425-457; Donald Kinder and Cindy Kam, *Us Against Them: Ethnocentric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Opin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David Rousseau and Rocio Garcia-Retamero, "Identity, Power, and Threat Perception A Cross-National Experimental Stud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1, No. 5, 2007, pp. 744-771; Paul Sniderman, et al., "Predisposing Factors and Situational Triggers: Exclusionary Reactions to Immigrant Minor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No. 1, 2004, pp. 3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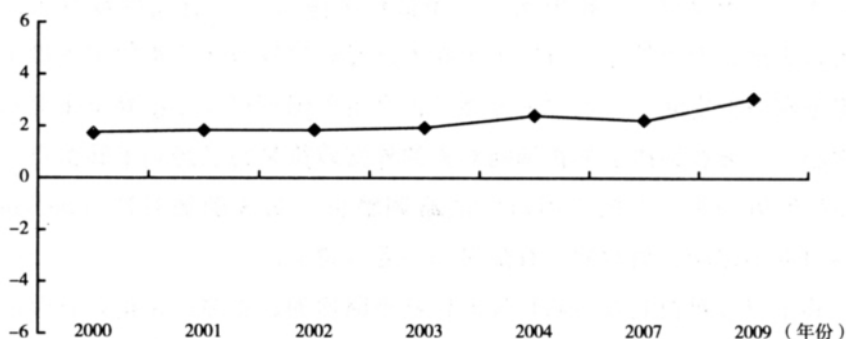


图3 中美民众所感知的身份认同差异（调查对象为中国民众）

资料来源：北京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年度调查*

* 这一量表用于衡量调查对象认为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特征和特点存在根本性差异的程度。北京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年度调查 1995 年至 2009 年每年对北京市居民进行随机采样调查。从 2000 年开始，这项调查要求调查对象评估中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本质特征。这使我们得以根据奥斯古德的语意差异分析技术作出一张身份认同差异量表。首先，调查对象会在 1—7 分的范围内回答他们认为“作为民族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然后回答他们认为“作为民族的美国人”是什么样的。调查人员提供 5 组两极形容词供选择：爱和平—爱打仗，道德—不道德，谦虚—自大，真诚—不真诚，以及文明—不文明。接下来，计算 5 个单独分值的平均值，作为一个认同分值，再从美国人总分中扣除中国人总分，画出身份差异量表。如果人们自身所属团体和外团体之间的感知身份差异程度更低，说明调查对象觉得外团体更“像我们”；如果感知身份差异程度更大，意味着调查对象觉得外团体“更不像我们”。关于奥斯古德语意差异量表的内在逻辑，参见 Charles Osgood, George Suci and Percy Tannenbaum, *The Measurement of Meanin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7)。为了使 2007 年和 2009 年数据与以往年份更具可比性，图 3 中 2007 年和 2009 年的结果只包括北京市区调查对象。

就美方而言，美国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话语近期纷纷迅速使用“过度自信”（assertive）一词来形容中国的外交政策。一些自由派分析人士开始同更保守的政治分析人士一起认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对美国及其价值观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挑战。^①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名分

① Naazneen Barma and Ely Ratner, “China’s Illiberal Challenge,” *Democracy: A Journal of Ideas*, Vol. 1, No. 2, 2006, pp. 56–68; Naazneen Barma, Giacomo Chiozza, Ely Ratner and Steven Weber, “A World Without the West? Empirical Patterns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2, No. 4, 2009, pp. 525–544; Steph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析人士甚至走得更远，称中国为“革命性大国”。^① 尽管美国政府还没有走得这么远，但仍然存在对中国领导人已经认定权力变化给中国提供了更多追逐利益的空间，以及中国最终是否会把美国军事权力排除出东亚地区的担心。双方在话语上都在询问对方的外交政策是否已经到了转折点。一些中国军方分析人士把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称为从接触加对冲 (hedging) 变为对冲加接触，而对冲是有限遏制的委婉说法。

鉴于双方对彼此权力和目标的怀疑不断增加，更多的讨论开始关注以往策略的智慧。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正如安全困境理论和归因理论所预期的，面对对方发生的变化时，双方看起来都会认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策略几乎是持续不变的。因此，他们想知道，对方这种变化（属性上的变化）是否需要本方改变自身的策略（情境的变化）。在中国，一些人以多种形式反思不把美国作为对手、不挑战美国在东亚主导地位的基本策略。其中一种形式是讨论中国是否可以以及是否应当成为老大或老二。一些人赞成做老大，认为依照现有经济发展轨迹，中国将很快赶超美国，进而能够更加积极地捍卫与美国不一致的自身利益。另一些人赞成当老二，认为中国面临经济社会问题，而且美国有能力彻底自我改造和恢复活力（正如美国在越南战争结束后那样），这意味着中国在谈论其拥有取代美国而成为体系首要国家的能力时，应当更加现实、少一点野心。然而，老二的位置并不好坐，因为它不但必须听从老大的旨意，还要承担保护家庭内部其他更弱成员利益的责任。^②

另一种形式我们更为熟悉，即关于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准则如今有多大意义的辩论。这一准则旨在避免在国际关系中承担领导作用，但努力做成一些使中国受益的事情。人们倾向于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理解为接受在国际关系中的从属地位，有意识地做出不挑战美国霸权或不把美国变成对手的决策，一切为经济发展服务。近年来，中美

① Elizabeth Economy, “The Game Changer,”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2010, p. 142.

② 笔者对关于老大和二老的辩论的理解得益于2010年10月在北京香山论坛上的讨论。

关系无论何时朝着更具对抗性的方向变化，更强硬的声音总是支持放弃“韬光养晦”，突出“有所作为”。

这场辩论还有一种形式是讨论中国的身份认同。中国是否有着独特的特点，以至于自然应当采取中国利益优先的政策？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特点最终是否要与穷国和反美势力结盟？或者中国是否因全球化受益，是否因此需要与包括美国在内、基本利益相同的世界其他国家结盟？^①

美国国内过去几年也有类似的辩论，核心是讨论为了制约或“塑造”中国的对外行为，美国应在多大程度上更独断地制约中国的对外政治和军事关系。自由国际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都赞同把地区民主国家组织起来（尽管多少出于不同的目的）的观点。^②其他人使用诸如“遏制加接触”（congame）和对冲之类的术语描述一种动态性更强的塑造（并限制）中国权力和利益发展的政策。^③在一家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关系密切的智库提出“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概念后，一些中国军方分析人士将其视为美国打算“抵消”中国军事能力的一份声明。^④越来越多的中国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战略是强化地区盟友关系，以围堵中国崛起。

① 参见2010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举办的主题为“美国重返亚洲的态势、影响及中国的对策”的研讨会的相关报道《地区安全研究中心简报》，2010年第21期，第6页。

② 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Co-Directors,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 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2006), pp. 25–26 “John McCain Remarks,” *Hoover Institution*, May 1, 2007, http://media.hoover.org/documents/McCain_05-01-07.pdf. One America analyst at the Communist Party University has argued that this idea has not died and may feature more prominently in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ar future. 参见刘建飞《美国“民主联盟”战略的困境》，《美国研究》2007年第3期，第7—23页。

③ 关于“遏制加接触”，参见 Zalmay Khalilzad, et 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MR-1082-AF, 1999。在这里，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均有一些国防部官员用对冲一词描述强化盟友关系和军事部署的政策，这项政策的目的是威慑和抵抗中国的反介入和其余拒绝策略。参见助理国防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2009年4月29日的讲话，网址为 <http://www.army.mil/news/2009/05/05/20617-dod-undersecretary-army-may-be-asked-to-prevent-war/index.html>。

④ See Jan Van Tol, et al., *AirSea Battle: 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10)。

可能还有一个新的因素在速度和强度上影响着正在显现的美中安全困境。这就是新媒体（以及传统网络媒体）的作用。中美两国的情况看来正是如此：出于对发言权、市场、影响力和新颖性的竞争，媒体在报道和分析上倾向于夸大事件，并且推崇以民族主义的方式来解读对方的行为。新的普遍性理念和主导性叙述（在更为传统的话语中的议程设置）几乎在一瞬间创建并传播开来。^① 美国媒体建构关于中国的叙述时的迅速性和一致性即是明证。2003 年至 2004 年间，我们看到“贪得无厌的中国”这一话语几乎在一夜之间被创建，媒体连篇累牍地聚焦于中国“贪得无厌”或“难以满足”地“吞食”自然资源。而在 2010 年，我们再一次看到媒体在形容和解读美中关系摩擦时同样迅速扩散着“过度自信的中国”这一话语（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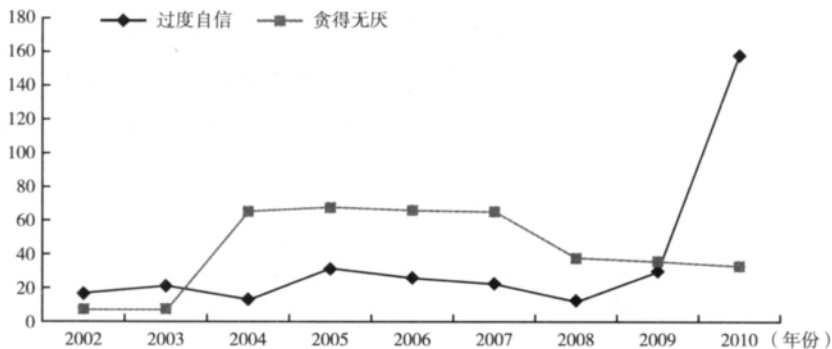


图 4 美国报纸和通讯社报道中每 5 个涉及“中国”的用词中提到“贪得无厌”和“过度自信”的频率

资料来源：律商联讯（Lexisnexis）。

^① 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博客圈和传统媒体就许多美国公共政策议题产生互动，相互影响对方的报道议程设置。另外，关于这类互动的议题，大多数互动的影响持续时间往往不超过四天。参见 Kevin Wallsten, “Agenda Setting and the Blogosphere: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stream Media and Political Blogs,”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Vol. 24, No. 6, 2007, pp. 567–587。就这个问题，笔者同样受益于与史蒂夫·克莱蒙斯的对话，他在 <http://www.thewashingtonnote.com/> 这家网站发博客。

一个具体案例是，美国媒体解读所谓南中国海是中国核心利益的声明时体现出了一致性。这些报道称，中国官员2010年3月向美国官员声明，南中国海是与台湾、西藏“同等”重要的核心利益。《纽约时报》2010年4月最先报道，这一消息以非常快的速度通过其他美国媒体和东亚国家媒体传播开来。中国媒体同样认为这一声明是真的。^①然而，迄今没有证据显示，而且有许多人同样怀疑，那名中国高级外交官员当时真的就是如此告知美方官员的。^②实际上，没有媒体报道质疑或者重新思考这种传统理念，尽管它对“中国过度自信”这种叙述的产生起了核心作用。

尽管如此，这种以及其他传统理念已经成为决策者不得不回应的新现实。媒体不仅是这些快速传播的叙述的唯一源头。在新媒体环境下，其他官僚政治行为者和利益集团同样能够变身成为设立这种叙述的第一推手，以迫使政府做出回应。一个与此相关的例子是，中国在美国为震慑朝鲜而在军事演习中向黄海派遣航空母舰一事上坚持了强硬立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实际上表明了中方对这些特别军演的立场，在2010年7月1日接受香港媒体采访并被问及如何看待韩国媒体关于美国将向黄海派遣一艘航母的报道时，马晓天使用了“非常反对”和“坚决反对”来表达中方的立场。^③数天后，7月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及马晓天的声明时，起初只表达了非常温和的立场，说“注意到马晓天副总参谋长的谈话”，只是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加剧地区紧张局势。^④但两天后，外交部的姿态变得更强硬并引用了马晓天的话。外交部发言人表

① 例如，《环球时报》援引《纽约时报》首发报道的文章《美称中国海军力量扩张到美国控制的海域》，《环球时报》2010年4月25日，网址为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0-04/791607.html>。

② Michael Swaine,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ur”.

③ 参见《解放军公开表态反对美韩黄海军演》，<http://news.sohu.com/20100703/n273256483.shtml>；《解放军副总长：非常反对美韩在黄海举行军演》，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7/01/1702694_0.shtml。

④ 《2010年7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http://www.mfa.gov.cn/chn/gxh/tyb/fyrbt/jzhsl/t714332.htm>。

示,中国“坚决反对”外国向黄海派军事力量^①。

当然,这些关于新媒体正在创造政府必须回应的新事实的猜想,目前也还只是猜想。笔者还没有注意到有任何关于新媒体对国家外交政策进程产生影响的系统性研究。但这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值得我们将其纳入关于安全困境驱动因素的理论化讨论之中。

结 论

当然,预测或事后分析中美安全困境始于何时是对安全困境理论的一个重要检验。简单地说,如果对时机的检验没有通过,就会严重削弱这一理论的解释力。但是,要推出旨在准确描述安全困境始于何时的经验指标并非易事。令笔者感到慰藉的是,事实上,就如何观察全方位安全困境是怎样开始的这一问题,许多理论学者都尚未作出说明。人们可能需要寻找本方安全决策进程的主导行为体在什么时候开始认定对方的安全政策对本方关键利益构成了重大威胁。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在上升至国家层次的国家间关系前,不同国家内部次国家行为体之间是否会形成安全困境,例如两军之间。如果存在这种情况,人们或许就可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海危机之后,中美两军之间就出现了次国家层次的安全困境,而且这种安全困境在最近几年已经蔓延至两国其他次国家行为体之间。我们不清楚中南海和白宫的主要领导人现阶段是否已经内化了安全困境所常见的信念结构,但笔者试图在这里表明,他们操作和决策的环境正变得具有安全困境的特点。

阎学通的“假朋友”理论,以及上文概述的安全困境理论,是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两种不同解释。但是,为了避免因变量的选择性,我们需要承认,尽管中美关系正显现出某种安全困境,但依然存在着稳定性因素(笔者认为阎学通忽视了这些因素)。这样的稳定性因素至少有四个。

第一,笔者认为,有证据显示,相对于公众辩论所暗示的,双方最高

^① 《2010年7月8日外交部发表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fybt/jzhsp/t71488.htm>。

领导层对彼此利益和红线实际上有着更清楚的认识。^① 有证据显示,中美两国有能力自我反思并矫正那些有可能助推安全困境动态进程的行为。^② 实际上,安全困境动态进程的许多证据来自两国核心决策层以外,大多数情况下见于一些与政府相关的、善于分析的群体,比如一些媒体和智库群体。当领导层软弱或者更注意其他议题时,这些群体的叙述和固有理念就有可能助推政策进程本身的安全困境动态。在这里,军事项目和旨在反制对方的政策背后的思维模式可能是个例外。在这里,即便是强有力的文官领导层大概也得努力监控军方的行为,确保这些行为与政治上的政策保持一致。不过,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观察正在加剧的安全困境的一个关键指标是,领导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制住强硬派的压力,使自身不受这种压力影响,或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动员反强硬派的声音和利益。

第二,威慑(包括核威慑)生效。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了发生重大冲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成本。这样,观察正在加剧的安全困境的一项指标就是双方主要行为者会在多大程度上开始忽视这些成本。

第三,相比美苏对抗,美中两国之间意识形态竞争的程度要低得多。意识形态上的差别当然是重要的,因为这些差别会凸显双方对身份认同差异的感知。但这些意识形态差别影响的只是本国社会如何看待对方,而在争取外国支持的竞争中却并不扮演主角。因此,观察正在加剧的安全困境的另一项指标可能就是美国自由派对所谓中国模式的批判有多大的吸引

① 例如,在笔者印象中,胡锦涛以及许多他的顾问重视限制双方挑战彼此根本利益的能力和意愿。一个例子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主要情报和分析机构之一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院长崔立如认为,尽管许多美国人支持遏制中国,但这些声音并没有主导对华政策决策。中国同样对从根本上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不感兴趣。参见 Cui Liru, "Sino-US Relations in a New Era," pp. 66-67。而相当多的中国分析人士和政治评论人士不会赞同这一分析。同样明显的是,通过对杰弗里·贝德、詹姆斯·斯坦伯格、埃万·梅代罗斯等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声明进行长期验证,这些奥巴马总统的主要对华政策顾问并不赞成遏制或阻止中国崛起。

② 例如,中国领导层似乎明显认识到,2010年,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外交在韩国产生了负面反应,中国应对南中国海问题的方式在东南亚国家同样如此。也就是说,还是有可供自我矫正的充分的信息和政治空间。例如,参见 "The US returning to Asia Posture, Influence,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p. 7。2010年晚些时候,中国在降低朝韩紧张态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同意开始与东南亚国家讨论更具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

力, 以及某种中国模式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开始指导中国在第三世界中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践。

第四, 经济一体化对两国国内相当可观的支持者都有利。中国的经济崛起受益于美国的政策 (例如, 市场, 投资,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从总体而言则受益于中国廉价的制成品和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因此, 观察正在加剧的安全困境的又一项指标是, 那些反对经济一体化并主张限制经济互动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其诉求政治化。^①

上述关于正在显现的美中安全困境的讨论显然是以简单枚举的案例为基础的, 针对阎学通的“假朋友”模型所推出的三个更明晰、推论更严密的假设, 这种替代性的解释还需要对其三个主要假设进行更为系统的检验。探究一项立论的合理性当然是初步学术研究的正当理由, 但笔者愿意鼓励阎学通超越他现阶段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评估, 进一步发展其“假朋友”理论的微观基础和经验意义。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2009 级博士研究生胡若愚 译)

① 大约 10 年前, 笔者写过关于中美关系正在显现安全困境的概率。这一论断最终成文, 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Beijing’s Security Behavior in the Asian Pacific: Is China a Dissatisfied Power?” in Allen Carlson, Peter Katzenstein and J. J. Suh, eds.,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当时中美两国同样存在不断恶意理解对方身份认同和政策实践的循环, 而且一些人也反思了现行策略的合理性。不过, 中美关系至少还没有从安全困境转变为更加“修正主义”导向型的国家间的对立。所以, 笔者当时的分析可能有误 (完全可能), 或者现在的分析完全错误 (同样完全可能), 也有可能所有或部分稳定性因素已经抑制了安全困境。

作者简介

邓子立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2010年在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获法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dengzili2008@sina.com

王翠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2002年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获史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cuiwen@nankai.edu.cn

徐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2008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xuj@cass.org.cn

杨原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2010级博士生。2010年7月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获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 yyir@163.com

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 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国际关系和历史学士,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 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专著有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等。

电子信箱: johnston@fas.harvard.edu

威廉·卡拉汉 (William Callahan)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系教授。专著有 *China: The Pessimist Nation*;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Resistance in Pacific Asia*; *Contingent States: Greater China 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等。

电子信箱: callahan@manchester.ac.uk

卡宁汉-克洛斯 (Linsay Cunningham-Cross)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候选人。

电子信箱: linsaydc@aol.com